

一国两文：清季切音字运动中 “国民”与“国粹”的紧张（下）

王东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清季切音字运动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意在创造一种便于下层社会掌握的文字，以广开民智，塑造近代国民，进而推动国家富强。但国粹主义者认为，语言乃是国粹的核心因素之一，而切音字运动仅把文字看做一种“记号”，不免有“废六书”的可能。而事实上，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仍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在切音字中维持一种“中国特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种“双轨制”方案，即以汉字保存国粹，以切音字普及教育。与此同时，不少切音字运动者着力表明切音字与古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对保存国粹的帮助。但是，“双轨制”方案所导致的“一国之中，两种文字”的局面再一次受到质疑。在此情形下，有学者提出，把切音字视为汉字的“补助

品”，以缓解“国民”与“国粹”之间的紧张。

[关键词]切音字 国民 国粹

[作者简介]王东杰(1971—)，男，河南省濮阳市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9-0145-10

四、“简字”不“简”：精英意识 与切音字运动

进入清末最后几年，普及教育与保存国粹两种思潮均盛极一时，欲在语言文字领域收到“鱼与熊掌得兼”之效的双轨制方案也获得了广泛认同。然正因为此，两者本已存在的紧张关系也凸显得更为清晰。这在对切音字性质以及其与汉字之间到底是何关系等问题的议论中也体现出来。

切音字和汉字的的关系在切音字运动中是一个

自始就相对模糊的问题。1892年，卢慧章指出：“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不但能识切音字，亦可无师自识汉文。兼可以快字书信往来，登记数项，著书立说，以及译出圣贤经传、中外书籍腔音字义，不数月通国家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①照此，切音字既是补助识汉字的工具，其自

^① 卢慧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第5—6页。

身也是一种可以流通的文字。这是为切音字运动者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唯侧重点随具体表述目标的不同略有调整而已。实际上,文字的双轨制方案便是和对切音字双重属性的认识相吻合的。

不过,至少从名义上看,切音字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字”的。而在各种正式出版的切音字方案中,除了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6年)、卢慧章的“中国字母”(1906年)、刘世恩的“音韵记号”(1909年)等少数几种外,也多命之以“字”。而在以上诸人中,也无人明确言及何以弃“字”而用“字母”、“记号”等。正式在“字”和“字母”之间做出区分的还是劳乃宣。1906年,劳氏针对王照在其书中“或称官话字母,或称合声字母、拼音字母,又质言之曰省笔字”的现象提出,“字母之称不能包括韵与声,似不赅备”,而应定其名为“简字”。^①此后劳氏不断上书,始终坚持识切音简字者应和识汉字者一体看待,成为选民。细味其意,实际也是要求政府给予简字一种“字”的地位。

但劳乃宣竭力为切音字争位子,也恰证明其地位不稳。一方面,切音字被公认不足以取代汉字。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切音字运动文献虽异口同声指出汉字难以掌握,要为国家贫弱负责,有些指责的语气甚至非常严峻,但也一直存在着回护的一面。有意思的是,这两重意味有时恰成为一个完整的因果关联,无法隔断,最能体现出论者内心的徘徊。蔡锡勇就说:“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②劳乃宣也说:“中国文字,渊懿浩博。其义蕴之精深,功用之阔远,为环球所莫及。顾学之甚难,非浅尝所能捷获,故但能教秀民而不能教凡民。”^③这些议论重点当然都落实在“繁难”二字,然“美备”云云也决非只是说说而已的“客气话”,至少表达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汉字的真正见解。因“美备”而“繁难”固是一大缺陷,但换一个角度,“美备”岂不就成了优点?

包括切音字运动在内的教育普及论经常援用的一个譬喻是把切音字和白话文称为与“锦绣膏粱”等相对的“菽粟布帛”,其意在强调普及教育的实用性,即所谓“恶其简陋而不厌其简朴”之谓也。1909年《申报》上一篇文章就说:“珠玉虽美,不如水火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此人人所知也,而不知我人生活上有必要之常理实务,同于水火布帛菽

粟,亦不能一日无。故教育以切实适用为要。”^④但同样是这个比喻,也可能包含另一重意味。潘籍鄂就说:“今夫重闺复闼,衣必文绣,食必膏粱,富贵之人则然。其在陋巷之子,短褐不完,日得藜藿以供一饱,固已甘之如饴,处之泰然。使富贵之人责其因陋以就简,且颯然虑其相习成风,将尽废其宫室衣服饮食也。有是理乎?兹字名简,固因陋就简之谓也。汉文犹富贵之人也,疑推行简字之废汉文,犹富贵之人虑贫乏者之废其宫室衣服饮食也,其是非尚待辨哉?”^⑤按此文乃是针对时人有谓推行切音字即欲废汉字的疑虑而发,故一方面固在为切音字辩护,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切音字不如汉字的意思。尤具提示性的是,一般认为,“简字”之“简”系简单、简易之“简”,潘氏则言为简陋之“简”,表明切音字运动内部在此问题上都还有不同看法,而汉字具有更高级的地位则基本为大家接受。

显然,汉字的“繁难”虽和“美备”分不开,但未必因欲取“简易”即要弃“美备”。实际上,“美备”固是一佳名,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繁难”也是一种稀缺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注意到上流社会有一种强调“训练的炫耀性消费”的倾向,一种文化资本的训练过程越为艰辛繁难,其“能力”价值也就越大。^⑥双轨制潜在的思路是从实用价值的角度理解切音字的意义,而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理解汉字的意义。在更重视“文化资本”的读书人阶层中,两者高下立辨。当然,这一行为倾向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而应是读书人长期养成的习性。前引梁启超那段话就既承认中国文字“美观而不适用”,又认为它与“适用而不美观”的质统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在多数人倾向以“有用”为标准判断学问价值的清季思想界,毋宁是对汉字高抬贵手,无意中透露了他对

①③ 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例言》,见《简字谱录》,第79、67页。

② 蔡锡勇:《自序》,见《传音快字》,影印本,第2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④ 不署名:《改良教育浅说》,载《申报》,1909-12-13。

⑤ 潘籍鄂:《推行简字非废汉文说》,见劳乃宣:《简字谱录》,第225页。

⑥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第34页,褚思真、刘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这类“炫耀性消费”能力的留恋。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切音字运动的参与者和赞助者的成分并不单一，其中不乏吴汝纶、严修、王照和劳乃宣这样的上流社会成员，乃至袁世凯、周馥等“封疆大吏”，也有不少是像卢懋章这样游离于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之间的人士和地方性的读书人。不过整体来说，除了沈学等少数人，汉字仍是其中绝大多数人自幼接受的文化训练的核心，也是他们平素所用的主要交流工具，实际上是很难真正放弃的。如果从识字与否的角度看，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下流社会民众相区别的。事实上，他们以“启瀛齐民”自任，先已有教化者的自觉，认同仍是“少数人”。

胡适曾批评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提倡官话字母”和“简字字母”的人们仍然把社会分为“不妨仍旧吃肉”的“我们”和“不配吃肉”只能啃啃“骨头”的“他们”。^① 在有意识的层面，这一指责或不免冤枉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未必不是真心要帮助民众。同时，中国本有允许以至鼓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统，“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并不固定。但胡适此言也确实敏锐地抓到了“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者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盖如果“下流社会”不得不成为被启蒙的对象，而启蒙者的角色自然要由“上流社会”担当。这样，“少数人”仍居于“多数人”之上。

切音字运动者的精英意识不可避免地在这一运动中有所显露。除了自居于启蒙者之外，切音字运动文献讨论的重心自始就放在提升识字率对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上，而很少提及识字对于识字者本人有何助益（也有，如前揭韩德铭等说帖，然相对比例极少），便是表现之一。陈虬在新字瓯文学堂的开学演说通篇纯用口语，显然是有意识对下层说法，而所谈仍不及民众本身的生活。实际上，如果民众真的像顾奎等认为的那样缺乏爱国心的话，这一宣传策略岂非南辕北辙？盖他们均是以国事为己任的读书人，而此运动的直接动力就来自他们对国家富强的探索，故虽在理论上认可民众乃是国家的主体，事实上对国家的关注却远超过对民众的关注。

另一方面，在清末十余年出现的三十套左右的切音字方案中，没有任何一种获得举国公认地

位（王照方案及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乃宣方案最流行，然仍不能一统江湖）。这固是因每一种方案都难免有缺陷，亦和官方的支持等因素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切音字创制者们那彼此不服输的精英心态作祟。如《中国音标字书》的作者刘孟扬就说，自己在“庚子之秋”开始用英文字母编造中国音标字，未成，“易而为形似日本字母之新字”，但与王照方案“亦迥不相同”。刊行将半，见到江亢虎“用英字造成通字，又触动旧兴，以为人既能造，诿我独否？故又取原编未成之旧稿，重加研究”，所成与江氏有同有异，惟“期取用利便，既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② 虽说“不敢立异”，但“人既能造，诿我独否”一语，已经生动地透露了“立异”才是其初衷。这显然不是刘孟扬一个人的心思，其时已醉心于万国新语的吴稚晖当时就讥笑不少切音字作者“忘其苟简之术，不足为别于文字之间，故离旧文字而独立，歆于作苍颉第二，遂失信用于社会”。^③

但问题是，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苍颉第二”的。《时务报》发表沈学文章后，屠寄就写信给汪康年，表示不以为然：“贵报选择文录尤宜谨严，如先时《盛世元音》之类，文既鄙俚，字又杜撰。沈学何人，足当同书考文之任？而贵报录之连篇累牍，甚无谓也。”^④ 1897年，蔡元培读过宋育仁《采风记》后，特别赏其“说例欲因中国籀、篆择定简易文字，成中西复古同文之盛，闳约深美，非沈学辈所知”。^⑤ 这两例特别能说明一些自居中国文化正统的人士对于沈学这样较早涉入切音字运动而居于文化边缘者的轻视。而实际上，被正统读书人看不起的切音字运动参与者也非仅沈学一人。1906年，学部批文就批评卢懋章《中国切音新字》一书有若干不合音韵学原理之处，并特别指出：“今欲造中国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必须考求中国古来三十六声母和四类韵母，“参酌古今

①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册，第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刘孟扬：《弁言》，见《中国音标字书》，影印本，第4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③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第40页。

④ 屠寄致汪康年，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188页。

⑤ 蔡元培：《宋育仁〈采风记〉阅后》，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76页。

韵书”，以确定若干个标准声母和韵母。声韵既定，字母的形体则可仿日本假名乃至罗马字，再“依《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为定程”。^① 1908年，章太炎更是把当时的各类切音字方案一笔扫倒，谓其“既于韵学茫无所了，又复自守乡土，不遍方音”，不足“袭用”。^②

制造切音字本需深厚的小学底子，蔡元培等人看不起沈学这类“洋学生”，也并不奇怪。1906年，《中外日报》发表的一篇批评劳乃宣增添方音切音字的来稿也表示，“改良旧有之字，乃至大至难之事业，非精通小学与西国语言学者，恐未易从事焉。西人欲于一字之中，改一字母，无不考其字原，出之郑重。学校中注重希腊、拉丁文，高等小学中即讲求本国文字之本原及沿革。彼之希腊、拉丁文，犹我之小学也。盖文字虽为一种记号，然经古来才智之人创造之、改革之，通行已数千年之久，书写有亿兆人之众，决不容指旧有之字为繁难，而率尔变易之也”^③。这里说的是欲改良文字必精通小学与西国语言学，但看下面的论述，主要指的还是本国的小学。

小学本是清代显学，读书人多少有点训练，然其时已被认为不能提供富强手段而呈现败落之相。现在切音字运动则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把极熟悉而又“无用”的知识与富强这一时代大目标结合起来的途径，故对那些古学深湛或自认深湛的学者尤具吸引力。《新编简字特别课本》的作者沈韶和就说：“曩读报章，尝见有简字学堂之议，初未经意也。”后读劳乃宣书，“一再寻绎，深悟其得简易之途，洵为当今启迪捷法。继玩其所定字母韵目，各简笔之字间有相浑于常用之字，且为母至六十余，不免重叠，似犹未臻简之极点；而韵目仅十八，似又太简。因忆少时曾从事于音韵之学，窃有心得”。加之友人怂恿，故另编一套课本。^④ 沈氏初对简字事业未尝经意，自述中更几乎完全把此视为音韵学的商讨，其意向可知。

显然，清代学术传统对切音字运动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小视的，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切音字运动中的精英意识。就对这一运动的影响力而言，王照、劳乃宣等可谓后来居上，章太炎方案更成为后来民国时期注音字母的基础。其中虽有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及其支持者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事实上，最

早倡导切音字的卢慧章、沈学等中国文化边缘人其实在此运动中都只具一些地方性的影响，而在上层读书人加入切音字运动后，他们再一次被边缘化了（而身为传教士的王炳耀则几乎很少为人注意）。

随着切音字运动参与者“社会成分”的变化，以及保存国粹的观念在朝野中得到广泛认同，国粹主义对切音字运动的压力也在加强。劳乃宣是后期切音字运动的主要辩护人，曾就这一主题做过多次阐发。1908年，他在进呈《简字谱录》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日本蒙学先习假名，文理渐进，渐增汉字，其高深之学，则全用汉字，不杂假名，是其明证。”^⑤次年，劳氏上折请于简易识字学塾附设简字科，又云：“简字有声无义，仅足以代口语。义理之精微，经史之渊雅，仍非汉字不可，简字万不足以夺之。”简字科既是附设，则“与汉字正课并行不悖，两不相妨”。他认为，“汉字正课，极其功效，能令百人中五人识字，而此附属之课，能令不识汉字之九十五人，皆识简字，则百人皆识字矣，不尤为教育普及之助乎？若专学简字之人，能兼识汉字数百数十，则更为有用，亦可量其资质，酌加教授。”且“既识简字，即可以简字注汉字之音，则汉字亦易识矣。是简字非特无妨汉字，且可补助汉字，为识汉字之门径也”。^⑥

若汉字的识字率只能达到5%，而切音字可达到95%，则“正课”与“附属之课”岂不恰好应该颠倒过来？显然，劳乃宣对切音字在提升识字率

① 《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69—70页。

②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第3336页。有意思的是，前揭吴稚晖文便主要是针对章太炎（也包括其他作者）而发的，故其下文云：“今就创作中国切音而论，惟作者浅注字端之术，莫能最良，然又何必虚情陈腐，必取晦拙之篆籀，为梗于浅易之教育。”吴氏认为，“附益于今隶之旁，莫妙于仍作今隶之体。”（第40页）则章太炎虽看不起其他作者，且不认自己所造为“字”，然在吴氏看来，仍不出要做“苍颉第二”而已。

③ 不署名：《统一语言说》，载《中外日报》，1906-09-24。

④ 沈韶和：《弁言》，见《新编简字特别课本》，影印本，第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⑤ 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折》，第340页。

⑥ 劳乃宣：《奏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一科并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折》，第352—354页。

方面的信心并没有被批评者打垮,而他的辩护词也被其同志认为非常成功。1910年,一批京官在《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中所云便显然是照抄劳文:“或谓汉文为中国国粹,此字盛行,恐汉文因而渐废,非所以葆存古义。是以学部审慎,迟徊不敢轻议。不知汉字有形、有声、有义,至精至博,亘古常新,万无磨灭之理。日本之有假名,已千余年,至今汉字盛行,毫无妨碍,其明证也。”^①不过,与此同时,这几份文献在此问题上的辩解姿态也清楚地表明,对于切音字运动者来说,来自国粹主义立场的批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劳乃宣自己也确实相信六书精微、不可磨灭,这看他为简字辩护的策略即知。他反复强调简字粗浅,不足以进高深,故根本不可能危及汉字。切音字运动的另一位参与者郑东湖的看法和劳乃宣如出一辙:“难之者曰:使切音字一旦实行,则举国人士必目击汉字之烦难,不如切音字之简易,将舍重就轻,皆趋尚于切音字,而汉字转为湮没,则于汉学前途大有妨碍,得一失一,亦何足贵?噫!是直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见耳。试征诸日本。千百年来汉字以[与?]假名并用,无可轻重之分;延至今日,汉字亦依然用之,尚无淘汰之举。彼为外人,尚推重汉字如此,况汉字乃吾国固有之字,且吾民好古之心甚富,亦曷尝不思保存国粹,转因切音字之进行而为汉字之妨碍哉!”^②

与前述沈学和马体乾的态度相比,劳乃宣和郑东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是极强的,反过来,其批评者对汉字竞争能力的估计倒类似于沈学,并无多大的信心。因此,在对汉字的看法上,切音字运动与其批评者之间以及切音字运动内部都不无分歧,且有交叉相错之处。不过,虽然具体观点和表达方式都不一样,但他们在汉字作为国粹的代表而应予保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从卢慧章到劳乃宣都在使用的另一策略就是强调切音字对汉字不但无害反而有助。早在1895年左右,卢慧章就提出,中国不但字难,而书籍尤难。“《大》、《中》之深沉蕴奥,《诗经》之字句生涩,《书经》之诘屈聱牙,《易经》之幽深元渺,至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之宏富,《渊鉴类函》、《子史精华》之浩博,历代之诗词歌曲,累朝之诸子百家,一朝有一朝之文字,一代有一代之格式,是读汉文之书,不啻一人而兼习千百国之隐

语也。”然日人“以切音文佐读汉文。凡汉文字典紧要处,我以为深奥而不解其音义者,彼皆以土腔白话,译其字音解释,抉其精微蕴奥。是切音字大益于辅翼昌明汉文汉字之风化也明甚”。^③

与此相类,1905年,劳乃宣在江宁简字师范学堂演说,针对“简字一兴,但有声而无形义,六书之学皆废,说文之书无人诵读”的忧虑表示,此“见非不卓。然此不必虑者也”。从性质上看,“简字者,特三十六母之省并,反切之便易者耳”,并非完全脱离传统的新造。进一步,正因为简字较反切更为简便,故反有助于光大国学:“今世学者以《说文》为专家之学,通都之中,习者仅数人耳焉。其故皆由阻于艰奥,故习之者少。若通简字后,再习《说文》,则易矣。何也?《说文》多从音训,戴段皆由此入。不知声音之理,徒执形象以求,未有能悟者也。……今所行宋本《说文》,每字下必注云某某切,不知者读至此,即懵昧耳。今夫通简字后,则凡有反切之书,皆迎刃而解。然则简字者,非惟不足湮古学,而且可以羽翼古学,光辉古学,昌明古学,尚何虑哉?”^④

江谦也提出,江永“论反切之用曰:读书而不知切字,误读必多;教人而不知切字,授读必误;著书而不知切字,流传必谬。知反切固读书之第一义也。而求之今日之小学国文教员,百不一二”。然其若“知简字则知声韵,知声韵则知反切之根,略涉韵书,便知奥窾。故简字风行,而古来反切等于无用,以其繁也。然简字风行,而反切之事亦人人能知通其本也。”而“经籍训诂,转注、假借,大都双声,盖源于《尔雅》”,必通汉学方明。“知简字,知声韵,则于古人转注、假借之方,考而求之,心通其故。而他日从事文学专科者,经学之盛,国粹之昌明,必倍于曩时,断可知也。”这样,切音字不仅便于“通古”,且能“通今”,不但“宜于主流以下之人民,而尤宜于学士大夫之子弟也”。^⑤

① 韩印符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28页。

② 郑东湖:《切音字之说明书》,影印本,第10—1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③ 卢慧章:《四续变通推原说》,第15814—15815页。

④ 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简字谱录》,第213—214页。类似的讲法另见其《进呈简字谱录折》,第340页。

⑤ 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载《申报》,1910-11-01。

江谦此论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劳乃宣,然其意义已不仅是强调切音字对汉字的助益,实际上突破了双轨制将“稽古”与“通今”、“上才”与“下学”打成两橛的思路。他虽着力论证简字有利于反切原理的普及,进而昌明国粹,然重点已落在古来反切之法“无用”上,实即意味着反切法可以废去。这样,古今上下得以重新打通,但已是建立在切音字的基础上。故江谦此论恐怕主要还是针对上流社会而发,更近于策略性的说辞。不过,他在理论上仍认可古学的重要性。

比较起来,劳乃宣的议论虽亦有同样的意味,但更偏重于古学本身。他强调切音字原理出自小学,恰是前揭《中外日报》文所说改良旧字必须精通小学之意。实际上,劳氏也正符合这个条件,他早年所著《等韵一得》就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劳乃宣与其批评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而值得重视的是,这一看法也意味着切音字实不像其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浅显。1905年,劳乃宣就在《重订合声简字谱》一书中指出,“音韵之理,以母、韵、声三者为大纲”,其“条理至为精密”。此书仅为普及教育之作,“但求其易学易解,此等精微皆置不论,而其理则仍相贯通,不差累黍。生徒学此简字,但期应用,原可不必深求;而好学深思之士,则不可不知其源流。其习为师范者,将为人师,非心知其故,无以应答生徒,尤不可不求甚解”。^①

1906年,劳氏另著《简字丛录》,再次声明:“简字之用,专取浅近易晓。余编《增订》、《重订》两谱,凡深微之理,闳远之论,一语不敢阑入。惧人之畏其难,盖教科书之体然也。然简字本于等韵,等韵为小学家精诣,其义蕴颇深,且其沾被,可使亿兆同风,运量亦极广远,非竟卑无高论者。”《简字丛录》即谈此“高论”之作,其意在“补两谱所未备”也。^② 1908年,劳氏又在上学部呈文中强调:“简字之法,根于等韵。等韵为小学家精诣,义蕴颇为宏深。简字各谱,以取易解,故于精微皆置不论,而欲究其本源,非上溯等韵不可。”^③

劳乃宣反复强调简字并不浅显,与大多数切音字文献的论述风格大相径庭,也和他自己说的“简字粗浅”调子不一致(惟亦并不与之矛盾,盖一是讲原理,一是讲应用也),而是与直隶官话拼音教育会说帖强调“普通知识”并不“单简”的认知有

相似处,然取向又不同。直隶拼音教育会说帖是站在为下层的立场上发言,劳氏的基本目标则是为了争取上层的欣赏。这正说明当时的士大夫中确有鄙陋切音字为“卑无高论”者,且势力不小。然一旦将其与等韵结合起来,切音字就立刻获得了一高贵的出身,自易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劳乃宣1910年和汪荣宝、赵炳麟联合发起“简字研究会”,便正是希望以此打动更多的读书人:“简字之法,以母、韵为体,以反切为用。读书之人,本明等韵者,一目了然;未谙等韵而能知反切者,数刻而解;未习反切而能辨四声者,极迟数日无不晓者。捐俄顷之心力,即足为拯全国蚩蚩之用,吾知必为贤士大夫负先知先觉之任者所乐为也。”^④

这样一来,切音字与国粹就成为相互照应的关系:切音字有助于古学的光大,古学又为切音字起到了“正名”作用,彼此契合,相当圆满。应该指出的是,劳乃宣这些话绝不能仅仅看做是为堵反对派之口的权宜之计,除了事实本来如此外,这一宣讲思路显然和其作为士大夫阶级一员的文化训练分不开,而这显然又不止是劳乃宣一个人的特色。马体乾就说:“国音音素字母,我侪于此既有特别之研究,而所研得者必皆特别之发明,于是乎应有特别之名称以表显之。此等名称平顺浅易者固属大佳,而确切雅驯尤为主要。”^⑤这“确切雅驯”四字特别点明了他那士大夫的文化自觉。

五、余论:“必也正名乎”

清季切音字运动一直坚持为下层民众提供一套读写的工具,进而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不过,在近二十年里,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的变化及与其他思潮的互动,其具体论述也多少有了一些改变。由于文字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表征之一,故这一运动一开始就被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认同的层次上。不过,整体来说,一直到庚子以前,其波及范围还非常有限,故问题也尚未尖锐化。1900年以后,切音字运动随着教育普及的思

① 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第161页。

② 劳乃宣:《简字丛录》,见《简字谱录》,第163页。

③ 劳乃宣:《上学部呈》,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2页。

④ 汪荣宝、赵炳麟、劳乃宣:《“简字研究会”启并章程》,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11页。

⑤ 马体乾:《谈文字》,第87页。

想进一步推广开来,而国粹主义也上升为最具影响力的时代思想之一,两者的关系急需界定,各种争论和调和的言论也纷纷出现,切音字的角色与地位也随之而跌宕起伏。

罗志田教授曾注意到,其时有关国粹的讨论,重点之一就落实在语言文字上。^①陶成章就说:“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只是“自唐、宋以降,故训日湮,俗义日滋,致三古典籍,罕能句读,鄙倍辞气,亦登简牍,习流忘原”而已。然“不学者遂视为艰深无用,欲拨弃之以为快,实贻害无穷。盖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②“艰深”二字正是切音字运动对汉字最多的批评之一;“无用”二字,则更近提倡万国新字的无政府主义者立场,然切音字运动也认为汉字实用性不足,故陶氏的批评也可以用于切音字运动。1910年,章太炎更说:科举时代,国学虽不盛,然“习惯相承,非易骤革”,其“变本加厉者,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此辈固当投畀魑魅,而咎不在后生”。^③此和劳乃宣提出切音字有助于小学的意见正相反对。

1908年《中外日报》一篇批评江亢虎所作通字的文章道:“吾国政体、学术、风俗、技艺,无事不当改良,独至于文字则当仍旧贯,而断断不可轻言改作。”作者所述中国当革之事包括了学术、风俗在内,实已近乎全盘,而独对文字一往情深,理由正是其代表了民族精神:“诚以文字者,一国精神命脉之所系,历数千年之习惯与数十百圣贤豪杰之所讲求。观其表不过记号之符,而国粹之菁华在焉。”因此,文字改革“势将举四千年来之武功文治、学问文章而尽亡之,不至于亡国灭种不止”。^④

同时,也有人站在教育普及的立场对国粹主义加以批评。1910年8月《申报》上的一篇时评就抱怨中国教育思想中“国粹主义”占了上风,严重干扰了“常识主义”:“一国自强之源泉基于教育,而教育之良窳又视乎高初两等小学之进退以为标准。此各国通例。所以汲汲于人民之常识也。”而“吾国不然,有国粹主义而无常识主义。多一次改良即加一番严重之保守,取六七八岁之童子,而使之刻意于圣经贤传,无怪人民之常识有日退而无日进也”。^⑤这是批评当时的“读经”课的,

唯按照同样思路,保存国粹与意在普及教育的切音字运动自然也就处在对立双方。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无抵触至少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的观念同时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时报》上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教育之所以难于普及者,虽原因复杂,条绪万千,然就其要者言之,则语言文字实为发达进步之一大阻力焉。”由于象形文字“字形繁琐,难于辨别”,加以“文法艰深,苦于求通”,一般民众“可以出之于口者,不能应之于手”,识字者自然不多。作者提出:“语言文字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必出之浅显,便于记诵,然后可以节省脑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把语言文字视为一国精神之所在,是国粹主义所常言。但文章的主旨在于强调汉字艰深,必须革新。作者并未明言其所谓“语言文字”与“精神”是固有的抑或可新造,如是后者,则新文字造成新精神,问题不大。然作者在下文明言:“语言文字贵乎由浅入深。小学以讲习平常切用之语言文字为先,所谓实用主义也。至于中学以上,则另立文学一科,专以高雅之古文词授之,所谓保存国粹主义也。”^⑥则其所谓“一国精神”大抵仍是固有者。如此,改革文字岂非将此“精神”也随之革掉?

作者在文末进一步补充道:“实用主义与国粹主义两者,似相冲突,而苟折衷至当,无所偏失,则于教育之本旨,岂有悖哉?所愿当世之教育家,斟酌而行之。”^⑦盖作者正是感到了两者的紧张,欲回到双轨制以解决之。实际上,由于双轨制在两大思潮中的中和立场,而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唯其中也还有不同的侧重。一般说来,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并不反对甚至根本就是国粹主义的维护者,且多受士大夫的训练,故面对国粹主义的进攻,往往处在守势,一面强调切音字只是汉字的补充(然也可作为单独的文字系统使用),一面竭力

①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45—147页。

② 陶成章:《教育今语杂志》章程,见《陶成章集》,第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选》,第11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④ 不署名:《某氏通字平议》,载《中外日报》,1908-09-29。

⑤ 不署名:《时评》之二,载《申报》,19100-08-04。

⑥⑦ 不署名:《论文言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载《时报》,1906-03-10。

挖掘两者的关联。另如沈学等人,既坚信汉字在文字进化序列中等级甚低,故不能自我保存,但又忧惧“千古之精英”一旦沉沦,不免如埃及、印度一样亡国灭种。需要指出的是,埃及、印度一类事例又恰是国粹主义论证“亡人国者先灭其语言文字”时常举的例证,亦可见双方的思想资源之重叠错落。

不过,双轨制本身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出现。1906年3月27日,学部主事许宝衡在日记说,有朋友向他介绍“近日某人新著减字法,仿东西各国以字母拼音,现已有专门教授此种字学。将来识字简易,可望人皆识字云云”。这里的“减字”殆即“简字”也,当时直隶、江宁均在推广,已颇有影响,而许氏不知,可知其平时确未留意。许氏闻此,“意不甚谓然”。盖“字学惟中国最精,若用减字法教授国民,则将来国文必致渐灭。所有书籍皆当改用减字本,既甚繁重,而古书将无人能读。若书籍仍从古字,而识字则从减法,是又多费一重时光,似未尽善”。^①

1908年5月21日,许宝衡再次谈及此一问题:“玉初(劳乃宣字——引者注)来谈。玉初在江南创办简字学堂,以谋下等社会人识字之利益,著有《宁音简字》、《苏音简字》等篇,并以都质夫所作《简字利弊说》见示。”显然,许氏此时对简字的知识已较前丰富,然仍说“余于此事窃不谓然。玉初谓,国文者锦绣膏粱也,简字者布帛菽粟也,二者必不能偏废。质夫之说以为非广行简字不能谋教育之普及,其言甚辩。余谓地球上,无论何国,决无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者,此中是非殊难解决”。^②许氏虽仍持旧见,而态度已较前软化,也对切音字运动产生了部分同情。但他仍担心“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会造成麻烦,至少会“多费一重时光”。这一认识对切音字运动追求的“易简”目标来说,无异一大讽刺。

“一国两文”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字观提出了挑战。前引马体乾文一方面强调文字作为“器”,要点在于简易;另一方面又把汉字视为民族“数百千年来之文物声明”的代表,则又不仅是“器”而已,而具有了“道”的意味。虽然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在双轨制中可以分别由切音字和汉字承担,看来并行不悖,实已离传统甚远。许慎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

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③也就是说,文字固是“器”,唯此“器”乃“道”的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已近乎“道”。此正是过去正统的文字观,也是马体乾对汉字的认知。但切音字运动所谓“器”主要指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和传统那与“道”相合之“器”的距离已不可以道里计。孙宝瑄就曾发现:“敬惜字纸,惟我国有此风气,若西人则直用之拭秽,毫不为怪。余始未能断其是非也,今乃恍然于我国字纸不可不敬之故。盖外国文字,记号而已;我国文字,能载道,岂可轻视。”^④在双轨制中,原本重“道”的文字观已成为新的二元文字观中的“一元”,而新的文字观又不免在“精神”和“记号”之间徘徊。

这不但意味着过去合一的道器关系成为可分者,且进一步和文化的社会分层观念连在一起。中国传统人性论虽有上智、下愚与中人之分,社会观念亦有匹夫匹妇与士君子的差别,但主流强调的倒毋宁是文化在不同社会层级中的连续性。《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即此之谓也。切音字运动的初衷是提升下层社会识字率,也包含了“合群”的目标(如前引王照所谓“朝野一体”)。然在双轨制中,下流社会通行切音字,上流社会通行汉字,虽上流社会成员在入门阶段或亦曾学过切音字,而下流社会很可能由于掌握了一套“易简”的文字工具而终身不识汉字,更有何“一体”可言?则其结果仍不出“官自官而国自国,士自士而民自民”,王照和《南洋日日官报》的那位“来客”等设想的合群之效终归还是落空。

更重要的是,如果承认切音字与汉字皆是文字,而文字中又寄寓了民族文化精神的话,“一国精神”又如何可以寄寓在两种文字中?若切音字无法寄托民族精神,则塑造国民的任务仍需由汉字承担;然双轨制方案把“保存国粹”这样的任务

①② 许宝衡:《〈巢云谿日记〉选》,见《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第15、42—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③ 许慎:《说文解字叙》,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本,第7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交付“上流社会”，又无异于认可“下流社会”可以无须此“精神”，则“国民”二字又有何着落？且若“国粹”只对“少数人”有意义，则又有何资格言“国”？

实际上，如果仅仅欲使“教育普及”与“保存国粹”两者得兼，问题本不必这样尖锐，盖此两者皆可由读书人一身任之。问题正出在“一国两文”的设想上。1907年春，一位叫李训铎的江宁人士便提出，切音字运动“无非欲使下流社会易于识字起见”。然这并不需采用另创新字的办法，盖“下流社会文字止可较上流社会文字稍浅，万不可绝然离为二物。日本之用假名，下流社会全用之，上流社会间用之，非二物也。若吾国简字，即使通用于下流社会，而上流社会必不屑习，则上下流社会文字又复各不相通，此尚成何世界乎？”另一方面，“欲教下流社会习字”本有“简便之法”，即把寻常通用的文字分为最浅、次浅二类。“吾尝欲选最浅者，每义一字，大约至多二千字，少则一千数百字可以略备。音以极正确之官音，注以极简明之浅注，作为初等小学堂必要之字典。凡著书出报，为小学生及下流社会说法者，即限于此典中字。”以后慢慢推广，自可普及。字数较少，推行较易，“而进之可以通于学问无限之途，退之可以交于举国上下流社会之人，较之习合声简字，其得失相去为何如也”^①

李训铎的意见是通过采用选定常用字的做法推广识字，与学部实行的简易识字政策的办法基本一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文字只应有深浅之分，而不能判然二物；选取常用字则不但可以避免社会上下不通之弊，且对个人来说，亦可由此进退，而不必成“另一世界”的人。这一建议基本秉承了“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那种彻上彻下的思路，代表了近代提高识字率的另一种取向。

前引批评通字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作者指出：“吾国文字，其为农工商贾所用者，不过一千余字。此千余字者，虽最鲁之资，日识两字，不过两年可毕。”然而，按照江亢虎的建议，蒙小学堂均用通字，等到高等小学堂再教之以汉字，“是昔之浅字仅一层功课，而今之识字乃增为两层功课也。斯不亦治丝而棼也乎？”^②显然，在作者看来，“一国两文”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其简易

的初衷背道而驰。这里的关键正出在如何界定切音字的性质上。

因此，随着切音字运动的发展，有学者提出要罢黜切音字作为一种“文字”的资格。章太炎是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人。他指出：“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因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③有趣的是，吴稚晖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其实是和章太炎一致的：“中国文字，本统一也。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音声亦不能不齐一。”他并明言这主要是指“今日所谓简字、切音字等”。^④这两位论敌尽管在对汉字的基本评价以及中国人是否最终应使用万国新语等问题的看法上截然反背，而对切音字用途的意见则殊途同归，在相当程度上暗示了切音字的命运。1912年，杜亚泉总结思想界有关切音字问题的讨论就指出，随着各种争论的进行，“最近数年来，世人对于切音字母之用途，乃渐变其初意。专以字母为象形文字读音之标准，即不以为象形文字之代用品，而以为象形文字之补助品”。^⑤

1910年，资政院先后接到6份说帖，请求颁行官话简字。作者地域范围涵盖了切音字运动较为流行的直隶、江宁、四川等地，上书者既有民间人士也有官员，均主张文字双轨制。不过，资政院以严复为特任股长的审查报告则提出，切音字虽有利于教育普及，然必经若干修正，其第一条便是“正名”：“简字当改名音标。盖称简字，则似对繁体之形字而言之。称推行简字，则令人疑形字六书之废而不用。且性质既属之拼音，而名义不足以表见。今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⑥劳乃宣此前特意改字母为“简字”，严复则正可谓针锋相对。盖严氏担忧的也是一国通行两种文字可能危及“六书”的生卢，而“简字”经此“正名”，其作用限

① 李训铎：《论简字学堂之弊》，载《时报》，1907-05-03。

② 不署名：《某氏通字平议》（续），载《中外日报》，1908-09-30。

③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第3336页。

④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第39—40页。

⑤ 杜亚泉：《论切音字母》，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1912年11月1日）。

⑥ 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4页。

于汉字“正音”的“辅助品”，“一国两文”的弊端也就此消除。

严复的审查报告在当时即获得资政院通过。1911年夏，各省教育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的决议也指出：“近今主张简字者，欲离固有之文字而独立，既乖保存国粹之义，转滋文字纷歧之弊。其法未为允当。然非审正字音，实无统一语言之良法。兹经详细讨论，余谓宜利用简字，改称音标，将音标附注字旁，作为矫正土音之用，较易施行。”^①其顾虑及解决方法均与严复报告一致，则改切音字为“音标”已有渐成共识之势。虽然辛亥革命很快爆发，但这一基本精神仍为民国政府所延续。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项任务的落实。不过，从整个思想界的情况看，杜亚泉的观察也略显乐观了些。文字的双轨制方案乃至废汉字

的主张并未随着这一决议案的通过而消失，且虽然决议案在形式上代表了“官方”意见，但仍然不过是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而已。政治鼎革后，相应的讨论还在继续进行，且随着文化观念的变更，比如“国粹”二字的“负面化”而变得更为激烈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08BZS033)的中期研究成果。初稿承罗志田教授指正，张仲民、陈默、翁若愚、刘世龙、吴铭能、徐跃等代为指点复制材料，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周奇)

①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次报告·统一国语方法案》，载《申报》，1911-08-17。

One State, Two kind of Writing System: The Tension between “Citizen”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Phoneticization Movement of Late Qing (Part II)

Wang Dongjie

Abstract: Phoneticization (拼音) movement was rise in 1890's. Its goal was inventing a kind of writing system for local people, and to make people's intellectual develop, mold the modern citizen, and make Chinese rich and strong. But the scholars of national essence movement argued that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system was a key ele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the phoneticization movement just regarded the writing system as symbol of language, s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ould become extinct. In fact, the most members of phoneticization movement still try to keep “Chinese feature” in alphabetic system.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gram was the “double track program”, which was to keep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to preserve the national essence and to use alphabetic characters to popularize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many members of the phoneticization movement try to reveal the inner link between alphabetic characters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But the situation of “two writing system in one state” in phoneticization movement led many critiques again. So, a new idea came out. That was to use alphabetic characters as the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characters to relax the tension between “citizen” and “national essence”.

Key words: alphabetic characters, citizen, national essence